



香港科研可多與深圳合作，圖為內地(左)與香港(右)的科研人員。設計圖片

# 徐立之 科技創業港 輸蝕 與深攜手待「鬆綁」

徐立之認為港深合作可發揮國際地位優勢。彭子文攝

## 內地水頭足 港校國際化

各有優勢

近年內地院校高速發展，聘請人才毫不手軟，港大前校長徐立之亦被浙江大學聘任為高等研究院院長，可見其發展的雄心壯志。不過，雖然內地院校資金充足，有利發展，但徐立之認為，香港的國際化程度仍然明顯較內地高得多，是香港的一大優勢。

### 赴浙大任院長幫「拖手仔」

徐立之今年初成為浙大高研院院長，他表示，自己的職責和擔任港大校長時相若，都是幫忙「拖手仔」，「其實就是統籌交叉研究的項目，讓不同領域的科學可一起進行交叉研究項目。」

他表示，現時高研院的發展相當好，「很多交叉研究開始，但結果還要等。例如腦和機器的合作項目，以動物研究來說，當老鼠要轉右時，牠的腦電波會有變化，如果將這些腦電波重播，牠就會右轉。」

徐立之期望，有關研究能令人類更駕輕就熟地運用機械，如傷殘人士可更好地用機械義肢，「例如你的腦想飲水，能否透過腦電波去控制機械手把水杯拿過來。」

### 有時錢太多反而難合作

如此厲害的項目，背後要有一定經費支撐，徐立之坦言，內地院校很有錢，香港八大加起來也未必及得上內地一所小校，「但有時錢太多，大家都自立門戶，就會缺乏合作。」

他表示，與內地院校比較，現時香港的國際化程度仍然明顯要高得多，這是香港的優勢，「香港院校要請人，還是會透過國際招聘，內地在這方面相對難一點，這不只是薪酬的問題，還有當地的配套問題，如果外國人去到一個城市，到處都是一個英文字都沒有的，他們怎樣生存？即使在學校能生存，他們離開了校園怎麼辦呢？這需要內地市政府和省政府花工夫。」

他指出，香港仍能做得好，是因為能夠和外埠合作，「這方面國際招聘幫助不少，令香港院校可以和外埠合作。內地則傾向聘請自己人，自己和自己合作，所以有『困籠』的問題，國際生即使去內地留學，也只是為了學中文。香港以英文教學，就可以招攬到學習其他專業的學生。」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

## 分享中三癡事 勉青年勿言棄

講座常客

徐立之雖然已卸任港大校長一職，但仍常見於青年講座活動。他雖然笑言：「他們找我，我又有時間，又沒有人替我擋，我就只好去。」不過，其實他也想藉自己「不順利的出身」，勉勵年輕人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和缺點，不要輕言放棄。

徐立之不擅考試，學業成績一般，不少人都知道，但原來他求學期間還有一則類似的趣事。他說：「我中三時曾參加英文朗誦比賽，當時讀中文中學，不是太多學生可以背到英文的詩，老師可能覺得我發音還算標準，所以被挑去比賽，但其實我沒有抑揚頓挫。」

練習時順順利利，正式比賽時，上台一緊張，就連第一句也說不到，「我常常說這是『遺傳基因缺陷』，我現在公開演講都要拿著張紙。」這亦反映於他考試時總不能好好發揮之上，慶幸他還能接觸研究，「研究是看解決困難的能力，看如何解決問題，可以慢慢做到深夜。」

研究做得好，除了為徐立之在學界帶來知名度外，也令他成功打入模特兒界，做了一次的西裝模特兒，「對方是一間社企，他和一些基金會合作，因為知道我做遺傳病的研究，所以就說如果我肯義務做模特兒，有關收益就會捐給遺傳病基金會。」

曾於卸任前說希望找到 Dream job (夢想工作) 的徐立之，現在亦找到了其「心水」，不是模特兒，而是加入團結香港基金，還有經緯慈善基金，繼續服務香港，「我對政治無興趣，但認為團結香港這個理念很好，自己在科學的創新、創意方面可以幫手。經緯也做很多支持學生科研的工作，與我一開始回來香港的原意一樣，那就繼續，當然我也真的會有退休一日。」

徐立之的當年在多倫多時曾擔任模特兒。資料圖片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

## 港企參與少 稅收法制盼有系統合作

人人都認為香港要走創新科研之路，但路要怎麼走，卻未見頭緒。去年從香港大學校長之位退下來的科學家徐立之，加入了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牽頭成立的智庫組織——團結香港基金，擔任創新、創意、創業專項研究委員會召集人，嘗試研究上述問題，盼能摸着石頭過河。有關報告雖然暫未出爐，但徐立之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，香港較其他科技創業城市「輸蝕」之處，在於企業的參與不多，而香港亦缺乏相應的生產作為推動，認為香港可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並發揮其國際地位的優勢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

不少人認為香港應走科創路，但亦有不少人對此不抱信心，徐立之卻認為，香港其實有很多人，很熱心地推動有關工作，「但用的方式不一樣，例如現時有40多個機構設立Coworking space (共用工作空間)，讓科技初創企業可以在那裡成立辦公室；有些人則以天使基金等形式支持。」

### 港研發工作 以院校為主力

雖然如此，但香港也確實有比不上其他城市的地方。徐立之指出：「我初步看到的最大分別，是企業參與的大小。」香港的產業集中，以金融、零售和服務行業為主，投入研發的開支只佔GDP少於1%，而需要設廠的產業都紛紛北上，從事的亦不是最尖端的高科技範疇，企業未有積極投放資源用於創新。他表示，不論以色列或瑞士，業界在推動創新科研上都佔了關鍵位置，不過他亦認為不同地方有不同做法，「香港既非單純一個城市，亦非國家，是否能集合不同優點去發展呢？」

徐立之表示：「很多人建議我們既有深圳在旁，應該做點結合。」香港現時的研發工作還是以院校科研為主力，近年不少院校大舉北上設立研發基地，是否好的趨勢？徐立之指出，現時兩地的合作並不是有系統的合作，「院校在內地有研發基地，但學者如何利用這個地方去發展，當中又牽涉稅收、法制等問題，例如在內地時間多於183日，就要收全年稅，連在香港賺的錢也要向內地繳稅。」

### 與內地合作 經費運用受「綁」

近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亦有研究經費供香港學者申請，但不少人希望經費的運用可以「鬆綁」，「現時的規定，研究經費主要用在材料、設備上，但其實做研究最重要的是人才。」再加上如港校學者投放較多時間於內地做科研，或令他們變成院校教學上的「兼職人

士」，其研究成果未必能納入研究資助局的計算中，這些都令內地與香港的合作造成了一定障礙。

### 嘆港人挖到金 即刻去炒樓

不過，徐立之對香港發展科技創新並不悲觀，「很多工作在進行中，未見到成果不出奇，創業這方面，也不一定成功，只是香港較看重成敗。」

他提到，例如在創新風氣旺盛的矽谷，於咖啡廳開電腦坐半小時，一定會有人問你在做什麼，「大家都在找商機，我可以做的事。」不過，在香港，就算有人掘到第一桶金，也可能想着去炒樓，因為大家被科技創業的失敗例子嚇怕了，成功例子又覺得與自己無關，「但其實失敗了可以重新來過，做研究也是這樣。」

他指出，「像香港科技大學的無人飛機就做得不錯，但去了深圳，希望該公司能回香港做研發。科學園也有些例子在初期發展有些『睇頭』，但香港的輔助工作不多，可以再加強Mentorship (師友計劃) 方面的工作。」他認為，如果大家願意互相鼓勵，其實香港要發展創新科技並不少，慶幸的是，其實企業對這條路也很有興趣。

徐立之作為召集人的「三創專項小組」，已在科技範疇做了研究，報告有近100頁紙長，希望能摸着石頭過河，「但報告未出爐，還要和持份者開會，聽他們的意見。」



徐立之加入了董建華牽頭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會。圖為徐立之送新書給董建華。資料圖片

## 解「分餅仔」爭議 倡「足球分組」模式

經費分配

院校研究是本地科技創新的重要源頭，但香港的研究經費長期被指不足，如何就經費「分餅仔」亦經常引起爭議。徐立之則認為，應以「足球分組賽」去看經費分配，做得最好的，就應該「界多、界足」，「正如踢足球也分甲組、乙組，不同組別的資助是否應有不同？我認為不一定要在同一個平台爭錢。」

當了多年大學校長，徐立之對香港院校的研究經費撥款亦有其看法，他指出研究經費無論怎樣都是不足，就其個人觀察而言，如何提升，要看屆時教育局及主理創新科技的部門怎樣配合，「現時大部分研究經費都是教育局給的，多少研究生也是教育局定，不是按市場需要。」

### 應按研究人員數分配

他坦言，現時要在制度上改變會有些阻滯，其中一個最難以改變的慣例，就是教資會按學生人數，而非研究人員給予經費，「研究經費

應該跟研究人員數，但這制度下卻是按學生人數分配，其實應該申請研究經費、配套跟着來，香港卻是先給 Indirect cost (非直接成本)，和研究無必然關係。有些不需要太多研究經費的院校，最終就用這個錢去請人。」

此外，他亦認為，現時評核院校研究表現的RAE (研究評審工作)，只是衡量文章、有多少引用、多少專利，「這是表面化了一點，應該也要看一些軟性數字，如英國等成熟國家就『識睇』，她們會看研究的社會影響和回報，這和論文的衡量是一樣重要的。」

### 「計分制度」累研究「離地」

他指出，這樣的「計分制度」，令學者只做尖端的「上游研究」，令學者做的研究難以直接貢獻產業，「要去到下游，要等很久。如果中游開始，就會更好，這方面理工大學的定位很具策略性，由中游開始，其航天、鐵路方面的研究，較其他院校優先很多。其實不同院校有不同角色，政府又是否能作出不同獎勵？」

他除了提出「足球分組」的撥款理念，也提

出了以學科範疇去分組的想法，並認為研究資助局的「主題研究計劃」是好的嘗試，「例如生物醫學以創新程度去衡量，由於開支大，經費也最多；工程、自然科學以可行性去衡量，經費較前者少一點；人文社科可能錢最少，但成功機會高，出過相關文章就可。」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



徐立之認為，研究資助可分組別、分領域進行。彭子文攝